

马尔卡斯特（Richard Mulcaster）就曾写到：“先天禀赋让孩子作好准备，后天教养使孩子得以成长。”三百年后，高尔顿将这一对单词变成巧妙、醒目的广告语，并迅速流行开来，成为了我们语言的一部分。但教养假设真正的鼻祖是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在大致的背景下，精心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：即成年人的心理疾患都可以追溯到年幼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，他们的父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弗洛伊德认为，两个性别相反的父母给孩子带来难以名状的痛苦，这种痛苦具有普遍性，并且是无法避免的。即使是极具责任心的父母也不能避免给孩子带来痛苦，所有的男孩都会经历恋母情结的危机，所有的女孩都会经历女性降价甩卖的阶段。母亲（不是父亲）也被指责是引发儿童早年两大危机——断奶和如厕训练——的人。

事实上，孩子并不是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而习得行为方式。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，父母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非常有趣，如把东西弄得一团糟、对别人发号施令、把火柴划着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，而他们是被禁止做这些事儿的。从孩子的角度来看，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：他们不能有像自己父母一样的行为举止。也许你在想，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里，孩子模仿同性家长是否会好一些，答案是：不会。在前工业化社会里，成年人的可接受行为与儿童的可接受行为之间的差距更大。例如，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乡村社会里，孩子必须服从大人，在大人跟他们说话时，他们才能开口说话。而大人在与孩子或其他成年人交往时并不是这样。尽管波利尼西亚的孩子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，学会织布或捕鱼，但他们却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习得社会行为规范的。在许多社会里，如果孩子的表现太像成年人，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。

节选自 Judith Harris. 《教养的迷思》